

超越与陷落

李清照的历史审理与现代解读



CHAOYUE YU XIANLUO

向梅林◆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超越与陷落

李锐·陈立言·胡鞍钢·周其仁·陈春山



CHAOYUE YU XIANLUO

向梅林◆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与陷落：李清照的历史审理与现代解读 / 向梅林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10

ISBN 7-5404-3591-7

I . 超… II . 向… III. ① 李清照 (1084~ 约 1151) - 人物研究 ② 李清照 (1084~ 约 1151) - 宋词 - 文学研究 IV. ① K825.62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9888 号

超越与陷落——李清照的历史审理与现代解读

作者：向梅林

责任编辑：刘苗松

装帧设计：山和水设计工作室 刘 峰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000

书号：ISBN 7-5404-3591-7/I.2215

定价：20.00 元

前 言

李清照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仿佛是一部男性作家专史。自先秦、汉魏六朝至唐代，男作家不计其数，而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女作家总共不过三十余人；《全宋词》共收录了一千二百多位词人，包括李清照在内的女性词人却只有八十三位。这些为数不多的女作家，大多只是以有限的几篇甚至一篇作品一露峥嵘，题材视野往往局限于闺阁之内，能够载入史册名传千古者寥若晨星。

这无疑是数千年的男权社会造成的结果。在漫长的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被界定在“第二性”的地位，极少有接受较高层次文化教育的机会。缺少文化基础，没有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只能被局限在闺阁庭院之中，既没有参政议政的资格，更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话语权被粗暴剥夺。面对无所不在的男性中心话语，女人们只能沉默不语，只有少数几个不甘沉沦者拿起了手中的笔（她们往往被视为不守妇道的异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李清照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特别动人的风景。这位才华出众、成就卓越的女作家，以自己丰富的创作、超绝的才学、本色当行的《漱玉词》而卓立于几乎专属于男人世界的古代文坛，压倒了众多须眉，为女性文学史失衡的天平增添了一个份量极重的砝码。她不仅诗词文赋成就斐然，创作理论建树颇高，而且精通琴棋书画，对经石之学，甚至医术都有一定的研究，因此，“她不仅是封建时代为数不多的女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个，即使在属于‘男

人世界”的封建文坛上也堪称‘大家’”^①。

从相关史料中,我们了解到,她的实际创作数量远远超出了流传下来的篇目:属于全集形式的有宋·晁公武的《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著录的《李易安集》十二卷。另外还有分别刊行的诗文集和词集: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题解》称《漱玉集》一卷,又云“别本分五卷”,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云李易安“有《漱玉集》三卷”,元·脱脱等《宋史·艺文志》载《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词》六卷,均可说明易安作品之丰。可惜的是,流传至今的作品却只有一百零一篇(据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统计),不过是冰山一角。

李清照流传下来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这些作品,以其丰厚的文化蕴含、卓异的个性风采、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不仅在两宋文坛,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牢牢地占据了光辉的一席,赢得了极高的赞誉。

她在当世就有才女美称,身后被推为“本朝妇人文采第一”^②,王士禛则把她和辛弃疾合称为“济南二安”,云:“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③沈谦则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④杨慎《词品》评曰:“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谭玉生《古今词辨》则叹曰:“若并诗中论位置,易安居士李青莲。”

当代不少海内外学者都对李清照推崇备至。台湾学者骆志伊

^①徐北文:《李清照全集评注》,第1页。济南:济南出版社,1990。

^②王灼:《碧鸡漫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

^③王士禛:《花草蒙拾》。

^④沈谦:《填词杂说》。

称李清照为“词国女皇”^①；陈祖美先生更是盛赞：李清照“对一代文学的光辉代表——宋词，从实践到理论都有着几乎是空前绝后的贡献”^②。

世界各国出版的主要百科全书，在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宋词的条目中，均对李清照给予高度评价。《不列颠百科全书》写道，李清照“是一位伟大的女词人，在中国词坛的第一流代表人物中，她应该名列前茅”。

她的身世曲折复杂而又苦难深重。得天独厚的优越成长条件，“夫妇擅朋友之胜”^③的幸运婚姻使她曾在幸福中沉醉；爱情的变故、再婚的羞辱使她无奈地陷于无处不在的男权文化的夹击缠绕之中；政治风雨的吹打、国破家亡、孤独飘零的深重苦难，使她承受着更为严峻从而也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

她用她全部的性灵感悟和生命意志，写尽了封建时代一个特异的女性既有传奇色彩又有典型意义的一生：少女的自然爽朗与娇羞纯情、少妇的温柔缠绵和淡淡哀愁、中年妇人的憔悴忧伤难言之隐、老年嫠妇的哀伤凄苦沉痛孤独……贯穿她一生的，还有自信自尊和不屈不挠的生命强力。

以一个孤独的女性生命个体，对抗着整个男性中心话语体系，在对抗与纠结中，李清照完成了对自身文化弱势身份的超越，最终成为堪称集宋代文学之大成的一代“大家”。

^①骆志伊：《词国女皇李清照九百年》；台湾：《浙江月刊》，1984年16卷11期。

^②陈祖美：《李清照评传》，第32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③明·江之淮：《古今女史》卷一。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一生甘苦有谁知

- 一 含英咀华 得天独厚 (001)
- 二 才情初显 名动京师 (013)
- 三 佳偶成婚 祸福相伴 (019)
- 四 世事反复 屏居青州 (030)
- 五 国破身零 屡遭磨难 (040)
- 六 苦难历尽 直面沧桑 (057)

第二章 “别是一家”塑词风

- 一 《词论》的卓越贡献 (070)
- 二 《漱玉词》的意象群体 (084)
- 三 “咏物词”的艺术成就 (113)
- 四 “易安体”的独特风格 (125)

第三章 词名难把诗文掩

- 一 诗名与词名 (141)
- 二 咏史言志的气慨 (144)
- 三 《打马赋》的胸怀 (151)

四《投启》的苦与曲	(154)
五《后序》的情与文	(159)
六 断片与残诗	(173)

第四章 挣脱从属的文化身份

一 异于深闺弱女的人格特质	(177)
二 士大夫情怀与生命意识的文人化追求	(190)
三 不同凡响的胸怀抱负	(205)
四 愁情词的文化内蕴	(214)

第五章 醉美风范与诗酒情结

一 文人骚客的诗酒传统	(222)
二 宋词与中国酒文化	(234)
三 易安的醉美风范与诗酒情结	(243)

第六章 当代文化视阈中的困境与挣扎

一 爱情婚姻的满足与焦虑	(256)
二 边缘与中心	(264)
三 母性的缺失	(271)
四 独特的女性视角	(274)

主要参考文献	(303)
--------------	-------

后记	(309)
----------	-------

第一章 一生甘苦有谁知

一 含英咀华 得天独厚

李清照诞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这一年,晏幾道五十四岁,苏轼四十七岁,黄庭坚三十九岁,秦观三十五岁,贺铸三十三岁,晁补之和陈师道均三十一岁,张耒三十岁,周邦彦二十八岁。诞生地有三种可能:一是山东章丘明水镇,二是其父李格非时任郓州教授的郓州,三是东京(今开封)。生于郓州的可能性最大,但迄今仍未找到足够的史料佐证。依据现有史料,虽还不足以断定李清照的准确诞生地,但至少可以肯定:李氏家族故里的确是在山东章丘明水。

《宋史·李格非传》载:“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女清照,诗文尤称于时。”笼统说清照父女为济南人,使不少学者误以为济南柳絮泉边乃清照故里。其实,宋代济南共辖五县:历城、章丘、长清、禹城、临邑,清照故里应在章丘。各代《章丘县志》中均有这样的记载:“按《大明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山东通志》云,莱芜人;阅明水镇西宋廉处士碑李迥跋云,从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许得廉先生之居云,观之确是明水镇人。”其中提到的颇具说服力的物证是明朝中期在章丘明水镇西的廉家坡发掘出的由李格非撰写碑文、其侄李迥作跋的隐士廉复的墓碑。(按:宋宣和碑仆倒后,元代廉氏后人廉锐之子廉遵谅又刻石立碑,是为元

至正碑。1981年文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元至正碑残碑四块,至今仍立于章丘李清照纪念馆。)

确切地说,李清照故里在章丘明水义仓。“义仓”之名是因为金人入侵后,李氏族人皆南渡江浙,故宅日益衰败,无人居住,成了义地,上面盖起了专供蓄积赈灾之粮的义仓,故名。义仓在百脉泉南不远处。百脉泉与济南的趵突泉齐名,乃明水诸泉之冠,绣江的主要发源地,因“百泉俱出”而得名。

清照故里乃是一个风光绮美、物产丰饶的好地方。女郎山峰峦奇美,龙盘山起伏磅礴,绣江蜿蜒曲折,百脉泉包孕灵秀。这里还是一个地灵人杰、文化高度发达的地方。著名的汉东平陵城古址及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就在明水镇外十几公里处。

李姓一族,在当地并不是有钱有势的显赫之族,却是齐鲁一带很有名望的书香世家。五十年后,李清照在一首长诗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如雨。”诗句不仅明确告诉我们她“父祖”的名望,还颇为自豪地把父祖的名望与齐鲁大地悠久而丰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稷下”,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就是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战国策·齐策一》里有这样的记载:“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可见当时之繁华。在这些摩肩接踵的人中,有不少就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

稷下学风延续到秦汉间,又兴起了名扬天下的齐学、鲁学、齐诗、鲁诗的各派学说。东汉时,又出现了一位影响极大的经学大师郑玄。郑玄在其故里高密聚徒讲学,弟子众至数百千人,形成一门“郑学”。

五代动荡之后,齐鲁之地的文化教育很快得到恢复,发展迅速。邹平人田敏,历城人田告先后致力于家乡的文化教育,从学者众。这种讲学风气一直盛行不衰,众多以弘扬儒学致国太平为己

任的学者即出于此种风气熏染(如范仲淹等),宋代最早最有影响的学派——泰山学派的形成,也是这种文化教育传统的成果。

与泰山学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东州逸党”诗派。此诗派以范讽为领袖。《宋史·文苑传四》云:“山东人范讽、石延年(曼卿)、刘潜之徒,喜豪放剧饮,不循礼法,后生多慕之。”可见他们不循陈规的放浪作风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

同处于齐鲁大地,提倡仁义、儒雅博重的“泰山学派”和不循礼法、放浪诗酒的“东州逸党”不可避免地互相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奇妙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这两种精神常常同时存在于齐鲁文人身上,互为补充,同时又免不了产生矛盾。

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就是齐鲁学风培育出来的一个典型学者。

李格非,字文叔,乃北宋后期一位著名文士。他博学多才,在经学、史学、佛学诸多方面均有突出建树。最为时人推许的是文学成就。他随苏轼学过文章,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文潜、秦观、晁补之都有密切来往,在北宋文坛上颇有名声,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当时号称苏门“后四学士”。

李格非的文学成就,从张耒、刘克庄等人的赞许中可见大概。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称赞李格非:“文高雅条鬯有义味,在晁、秦之上。”张耒则在李格非的墓志铭中也说,文叔“笔势与淇水相颉颃”。

《宋史·李格非传》所载之言更具权威性:“格非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晁补之则记得更具体:“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而名其堂曰‘有竹’……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①可见李格非之文思何等敏捷。难怪尹少稷称:“李

^①晁补之:《鸡肋集》卷三《有竹堂记》。

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①言虽过誉，但时人对格非文学才能的推崇自可见出。

李格非撰于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的《洛阳名园记》是当时广为传诵的名篇，为人们称颂不已。篇中有句云：“洛阳可以为天下治乱之候。”待后来洛阳沦陷，世人皆以为格非有先见之明，其言“可谓知言哉”^②！

时至今日，仍为日本三大庭园之首的“兼六园”，就是根据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命名的，可见其影响之深广。“兼六”，意指其兼备了宏大、幽邃、人文、苍古、清泉、眺望等六大功能。兼六园是江户时代历代加贺藩主营造的林泉回游式大庭园，面积约有十万平方米，集中了日本庭园的精华。

在文学理论方面，李格非在曹丕首倡、韩愈光大的“文气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诚论”，进一步指出气以诚为主，没有诚这个内容，就不能有外形之气，两者互为表里，而诚为根本。这在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宋史·李格非传》中有一段话可以作为他“主诚论”的注解：“（格非）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李格非强调诗文应以“诚”为主，这对从小很多时间是在父亲的书房中度过的李清照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影响。

李格非对经学的研究成就甚至还超过了文学成就。他撰写了数十万言的《礼记精义》等著作，对礼经的研究相当精湛。李清照晚年所写的《金石录后序》中有如下言辞：“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也可证明经学是李氏世业。

^① 韩滉：《涧泉日记》卷下。

^② 张琰：《洛阳名园记》序。

李格非的才学在史学上也有突出表现,这从他的著作目录中即可见出。

格非著作计有:《济北集》^①、《李格非集》五十四卷^②,又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③。今俱佚。流传下来的诗文散见于宋人载籍。

此外,从陈师道《后山诗注》卷四的《寄李学士》诗中,我们还知道格非对佛学也有一定的研究。

李格非不仅博学多才,学术建树颇丰,而且人格俊迈,品性高洁。

《宋史·李格非传》中记载的几件事足可为证:

在李清照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李家家境颇为清贫,当时的“郡守”对李格非的清苦动了恻隐之心,“欲使兼他官”,以增其俸禄,但李格非却以“不可”谢辞^④。

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李格非入补太学录。《宋史·李格非传》记载:“入补太学录,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

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四月,章惇为相,复行新法。六月,章惇策划编类元祐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李却“不就”,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江西上饶一带)“通判”。所谓“编类元祐诸臣章疏”就是辑录元祐诸臣的“罪状”,对苏轼等元祐臣辅进行严酷的清算和报复。李格非不忘师恩,恪守自己认定的道德准则,宁愿不任官职较高的“检讨”而离京任职低而权小的“通判”。李格非的人品于此可见一斑。是年,李清照十一岁。这对聪颖早慧的李清照来

^①见韩淲《涧泉日记》卷上。

^②见《遂初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

^③俱见《宋史·艺文志》。

^④《宋史·李格非传》:“为郓州教授,郡守以其贫,欲使兼他官,谢不可。”

说，无疑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品格教育。

李格非任广信军通判时，有一道士替人占卜祸福，偶有应验，身价倍增，出门必乘车，村俗之人竟被其迷惑。一次李格非路遇此人，令随从将道士从车中拿下，揭穿其奸计，杖罚后将其逐出广信府境。李格非坚持正义、嫉恶如仇的性格，对李清照的影响意义不可低估。

李清照的母亲姓王，这是已成定论的说法，但或曰为王准孙女，王珪女儿；或曰状元王拱辰孙女。二说皆有相应史料支撑。

庄绰《鸡肋篇》卷中载：

岐国公王珪，在元丰中为宰相，父准，祖势，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绍、李格非、闾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亦可谓华宗盛族矣。

王仲闻先生在《李清照集校注》后附录的《李清照事迹编年》中说：“以《鸡肋篇》与《宋史》较之，似《鸡肋篇》仍较可信也。”

此外，《名臣碑传琬琰集》卷八收录的《王太师神道碑》记载：

元丰八年四月，丞相王公珪感疾，诏国医诊视，遣尚官数就问，赐以御膳珍药。五月己酉薨于位。……子仲修以学登进士第，今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仲端承事郎籍田令……仲煜承事郎。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

这篇《王太师神道碑》，是元丰九年九月与王珪同时之人李法臣奉诏撰写的，这条材料不仅证明根据庄绰《鸡肋篇》的记载推断

李清照的母亲是王准的孙女是正确的,还进一步明确了李清照的母亲是王珪的长女,通过其“早卒”的记载,还使我们获得了李清照早年丧母的事实。

《宋史·李格非传》:“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女清照,诗文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王拱辰系北宋显宦,卒于神宗元丰八年七月。刘敞《公是集》卷五十一《王开府行状》、刘摯《忠肃集拾遗》中收录的《王开府行状》、《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二十所载《王懿恪公拱辰传》,以及 1976 年在河南洛阳龙门附近发掘出的由安焘撰写的《王拱辰墓志铭》等,对王拱辰子孙后代情况的记载都比较详明,而且大致相同,却没有提供任何线索能够说明李清照的母亲是王拱辰的孙女。

据以上史料,笔者大致倾向于清照母亲乃王准孙女、王珪女儿之说。但无确凿证据明确推翻颇具权威的《宋史·李格非传》的记载,亦难断定王拱辰孙女绝非清照母亲。从王珪长女“早卒”的记载,推断王准孙女、王珪长女乃清照生母,王拱辰孙女乃清照继母似有较充分理由。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清照的生母、继母,都是生于书香门第,知书能文,具有良好文化教养的女性。

无论母系还是父系,都给李清照提供了优秀的遗传因子,遗传赋予李清照以优异的先天禀赋。父母的文学素养影响着清照,他们与文人墨客们的广泛交往所营造出的浓厚的文学氛围,使年少的清照不断地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反复熏陶。这种得天独厚的童年经验,对她个性的形成及文学能力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此后的人生经历中,各种生命体验与独特的童年经验交织碰撞,不断地激活了她潜在的文学才华。

不仅是家庭环境,清照所生活的宋代社会环境,也使李清照自幼便有了接受文化熏染的机会。

陈祖美先生主张清照于十六岁前后,约元符元年末或二年初,

赶在上元节前夕进汴京^①。尽管陈祖美先生作出了基本判断,但语气仍留有余地,并未完全断言。因为,尚有一些不易解释之处。

约在哲宗元祐四年间,李格非太学录任满迁为太学正。为太学正时,在东京买了一所房子,晁补之于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五月二十八日为李格非作《有竹堂记》,其中有云:“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依据常情,即便以往各任家眷均不随任,则此时亦当随任,除非有某种特殊情况。而此种特殊情况,我们找不到任何依据。据此,不仅不可排斥,甚至应可推测李清照到东京的时间当在是年,至迟亦在次年。其时六岁或七岁。至于李清照十五岁左右在原籍章丘明水活动的足迹,解释为短期的返乡省亲是合乎情理的。另外,其父李格非如续娶,清照继母居京城的可能性应远大于远离京师、远离丈夫,去李格非的老家章丘小镇侍奉公婆。同时,幼小弱女远离父母居于原籍,似也不大合人之常情。

此外,王灼《碧鸡漫志》云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田艺衡编《诗女史》亦称其“幼有才藻”。既称其为“少年”为“幼”,则必然是在十五岁(及笄之年)之前。十五岁之前如一直居处于相对僻远的章丘明水小镇,虽然可以承他人教学而成诗才,但难以成就诗名,尤其是词名。若无都市文化的长期熏染,远居章丘的李清照,很难大量接触鲜活的都市市民文化,练成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的作词大家的艺术功力。若无文坛一流人物的肯定与赞扬,“幼有才藻”、“自少年便有诗名”亦缺少可能。依据以上理由,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清照幼年已入汴京。写完上段文字,笔

^①陈祖美《李清照评传》,第47页:“约在传主五到六岁之间”,“父亲在京任学官,又租赁了房子,按说李清照已有条件由原籍晋京,但她此时并未在京定居,甚至尚未到过京城,可能仍然留在原籍。”

者又在徐培均先生的《李清照集笺注》元祐五年清照七岁的编年中发现“格非官太学正，清照随父居京师”的表述。^①由此，更使笔者确信清照幼年即入汴京。

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这个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闻名世界的国际大都市。

南宋孟元老在他的《东京梦华录》里详尽地描绘了北宋京都风貌：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日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朱帘。雕车竟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奇珍，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②

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③

^①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第4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

^③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东南楼街巷》。